

谨以此书献给那片土地，献给我的父老乡亲以及中国所有农民兄弟。

长篇乡土风情小说

农 历

李国仁/著

农
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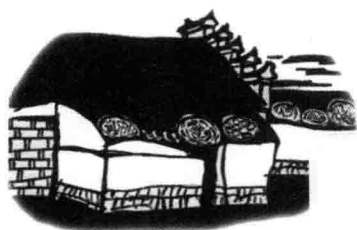
四川人民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那片土地，献给我的父老乡亲以及中国所有农民兄弟。

长篇乡土风情小说

农民

李国仁／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历 / 李国仁著.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220-09152-0

I. ①农…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4221 号

NONG LI

农 历

李国仁 著

责任编辑
助理编辑
封面设计
内文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章 涛
赵 静
原谋工作室
秦巴文化
蓝 海
王 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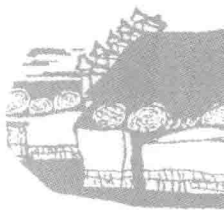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ichuan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官博
(028) 86259457 86259453
(028) 86259457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市和丰印刷有限公司
170mm×240mm
40.25
700 千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
ISBN 978-7-220-09152-0
59.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内 容 简 介



在苦竹滩那片贫瘠的土地上，主人公秦汉阳在歧视、贫困和苦难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正步入青春年华时，有幸迎来了党的“三中全会”，彻底改变了家庭和个人的命运。正当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生活中去开辟自己新的人生道路时，感情的挫折和婚姻的失败又给予他沉重的打击，最后他不得不选择了离家出走，远离了生于斯养于斯的秦家湾。多年的漂泊游离以及孤身一人在城市打拼，已使他逐渐厌倦了城市的喧嚣，越来越想念家乡，越来越觉得只有那片土地才是自己的归宿之地。十年以后，当他以一个成功人士的身份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时，他又茫然了，因为他所看到的家乡早已不是过去的样子了——传统意义的乡村以及农耕文明正在消亡。他不知道将来自己是回到乡村还是留在城市，一切都是未知的。只是，他带着十年前留在父母身边的女儿在返回城市的时候，他父亲把一个装有他们的家谱和一本发黄的《万年历》的木匣子交给了他。他知道，那是他父亲要他不要忘了自己的根在哪里。

这是一部七十余万字的长篇乡土风情小说，它以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为主线，以社会变革中苦竹滩上秦家湾的发展变化为辅线，讲述了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新世纪初苦竹滩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故事，重点描写了两代人不同的经历和生活态度。

这是中国第一部时间跨度最长的纯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以大巴山区苦竹滩上的秦家湾为典型题材，以点带面，

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农村、农业、农民近四十年来的发展变化。

小说全景式、多角度地着重描写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与中国广大农村一样，秦家湾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变革，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状况、精神面貌和不同人物的命运。小说以社会大环境和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深刻揭示了历史和现实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基层组织和普通村民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人物之间的个性冲突，同时，也体现了不同人物隐藏在内心的善良、虚伪和丑恶的人性；积极评价和褒奖了下乡知识青年对农村文明进步的积极影响；热情歌颂了党的改革开放和“三农”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勃勃生机。

整部小说，以朴实的地方语言和蒙太奇的电影表现手法，讲述了中国农村所经历的那段既让人啼笑皆非又让人伤感的历史。愚昧、荒蛮和陈腐的观念在那片土地上根深蒂固，从而演绎出主人公爱恨情怨、命运多舛以及对生活百折不挠的悲壮人生。

故事情节曲折、跌宕起伏，乡土气息浓郁，人物刻画细腻、饱满，有血有肉，性格突出。而小说中所揭示的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一些社会现象，均值得深思，值得一读。

代 序

发现了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

——评李国仁小说《农历》艺术世界的营造

秦兆基

作为叙事文学研究重要对象的小说，有着怎样的特点？它与其他的叙事文体有着怎样的区别？怎样把握小说的特点进行艺术创作？一直是文学理论家和作家关注的问题。我想针对有兴趣研究这些问题的同道介绍米兰·昆德拉经常引用的奥地利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的一句至理名言：“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发现了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①。

为了能拥有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发现，小说家要用自己“精神的眼睛”去观照社会和历史，一方面，将现实的生活场景放大千百倍，窥见它的每一个细部、每一个隐蔽的角落；一方面，剥去了种种表象紧裹着的社会人生，裸露出它的内核。进而用自己的全部感情去拥抱写作对象，去营建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

李国仁先生的长篇乡土风情小说《农历》，写出了只属于他的“发现”。

解题：“农历”的多重喻意

农历，又称夏历、阴历、旧历，是中国传统历法之一。农历属于一种阴阳历，所设置的二十四个节气能够反映季节变化特征。

李国仁先生用“农历”作为自己长篇小说的名字，可能有着自己的设想。从浅层看：其一，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秦巴县苦竹滩秦家湾，也就是光荣大队，是一个山腰上的村庄，除了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以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尚习惯等方面，基本上保持着中世纪农耕社会的模样，人们依然按农历安排生产和生活。历书上的种种提示、规定、禁忌，几乎是山村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

^① 艾晓明编译：《小说的智慧——认识米兰·昆德拉》，时代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行为准则。其二，故事每一阶段发生的时间，都是用节气来交代的。其三，历书上的节气是一个有形的、外在的经线，或者说是情节线，把大大小小的事件串连起来了。

从深层看，“农历”，是个隐喻，它的本体是“传统”。传统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既有我们民族最为宝贵、有着许多值得珍视的东西——母慈子孝、长幼有序、知恩图报、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等美德，但也有着安于命运、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官贵民贱等恶德。前者虽然经历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它们仍然赓续着，不绝如缕。后者也同样是根深蒂固的，永远难以消解。

作者既没有把秦家塋写成世外桃源，像沈从文、废名那样，也没有像某些革命作家那样把农村写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决战的生死场。即使是在“左”的路线大行其道、在受压迫最为深重的家庭中，还有笑语，还有温馨，还有挣扎前行的希望。在推行联产责任制、包产到户、农家得到喘息以后，这里也不是从此步入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人们就能尊严地活着，宗法制度、官本位、贫穷和落后，从意识形态和经济上仍然紧紧地禁锢着人们。如何对待传统，依然是绕不过去的坎。

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宋本清保有一本《万年历》，那是经过多少劫难得以留存的宝物。这个细节的设置，作者也许是有深意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万年如是，再剧烈的政治运动，也夺不走这本小书。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山村人来到外部世界，接受了先进文化，随着社会转型，一切既存的秩序必将改变。农历也许还会留存，作为民族的风俗、风情的象征，“节气”也许会留存在月份牌上，挂在人们的口中，但那些阴阳八卦种种禁忌，是会被人们忽略不计的。

光书名就谈了这许多，也许是过度诠释，不过也有其合理性。钱锺书说得很有意思：“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固殊，指同而旨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互立应多，守常处变。”^①喻有多解，亦有多义，如此而已。

命运：十年河东又河西

《农历》写了人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改革开放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看，游手好闲、作威作福、流氓成性的丑类和辛勤劳作、老

^①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页。

实本分、知书识礼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正好颠倒过个，应得上中国的一句老话，十年河东又河西。

作者透过社会生活的生动描绘全面地展示了苦竹滩人的生存史、生命史和精神史。

小说前半部分，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写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为止，前后十五六年。

山村生产效率极为低下，生活极度贫困。缺医少药，巫术仍然是人们拯救自己的重要手段。不少儿童和产妇，因为得不到及时疗治，无告地走向死亡。交通被重重山岭和湍急的河流所阻隔，即使要到邻近的村庄，涉过拦河坝，也会有生命危险。

“活着”成了人们生活最高目标，弱肉强食成了通行的道德准则。强者欺凌弱者，弱者欺凌更为孱弱的人。老实巴交的秃子水管员，老婆长期与一个江湖郎中厮混，两个人当着他的面在床上翻云覆雨，然后悄然出逃。这个水管员最后在田间的一棵青桐木上吊，了却自己的生命。

饥饿，煎熬着山村每一个人。粮荒制造出许多悲剧。公公逼死了儿媳妇，儿子成了疯子，一个蓬头垢面、衣不蔽体的疯子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不失时机地出现在本不该他出现的地方，却犹如一位世外高人，警示人们。

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之下，人们的良知几乎荡然无存。少数勇敢分子，亦即农村流氓无产者，冲在运动最前沿，把持农村基层政权，作威作福，横行无忌；多数贫下中农则在麻木中苟活，稍有不同意见，或者有了自己的经营，生活有所改善，也会尝到“专政”的滋味；地主分子及其子女，被视为贱民，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虽然不断忏悔，革面洗心，仍然受凌辱、敲诈，永远背着灵魂的十字架。

恶的嚣张和善的萎缩，几乎到达了极致。这种状况不止存于成年人中，也弥散到天真无邪的孩子之中。贫穷、成分好、缺少教养，竟然成了政治资本，某些贫下中农的孩子有恃无恐地去欺侮地主的子女，他们或诱过于人，或诬陷栽赃，把自己的过错强加到地主的子女头上，等看到他人代自己受过反而自鸣得意。地主的子女在学校也被视为“异类”，也和他的父辈一样要脱胎换骨，要用屈辱、泪水，为他们也许从没有见到过的祖辈们赎罪。地主家庭出身的小学教师，为了漂白自己，也不问是非，一味袒护有过错的贫下中农子女，参与对孩子心灵的摧残。

《农历》更着重写了普遍贫穷中更为贫穷、权力缺失到丧失得几乎一无所有的地主及其子女的生存状态，批判了这种状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能不说是

一种发现。当代学者王宏任先生认为：“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是反革命，那么革命对象指向富人就是错误的。当然，不是所有富人都是赞成革命的，正是不像所有的穷人都同情革命一样。”简单地从经济地位出发来看待人们的政治态度，是最为简单干脆的，但是免不了有形而上学之嫌。问题也正如王宏任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进一步论述的：“‘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产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的结构因素。”^①

《农历》没有把失去了土地的地主写成复辟狂，如同浩然《艳阳天》中杀死小石头的马小辫式的人物；而是把他们还原成人，化为有生存欲望、有着普遍人性的人，他们企盼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企望自己和后代能过上人一样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个近于渺茫的目标，默默地忍受着，正像小说中地主们一场谈话中所透露出来的：地主秦穆兴说：“最苦最不好干的活，大多是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人干，到头来就是进两个钱，生产队也拿不出来。”另一地主秦国忠劝解说：“算啦，变泥鳅就得让泥巴糊眼睛，当农民，好日子歹日子还得过下去。”《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规定：“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得按照其所从事之劳动或经营的性质，改变其地主成分为劳动者的成分或其他成分。其不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或有任何反动行为，或有违抗人民政府法令行为者，则不在此列。”^② 秦家塆土地改革结束二十多年了，但那里接受改造的地主，命运并没有丝毫改变。

社会和学校的压力、家长的护持、告诫和教育，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张力场，使得这些地主家的儿女，变得老实本分、勤恳踏实，但又留有许多疑问，激发了多重思考：关于家庭、学校、老师、干部、世道、命运、真理。本书的主人公秦国忠的儿子瑞元，就是大名叫作秦汉阳的那个，正是在思考中成长起来的。“为了让思想摆脱不言明的状态，我们不应该满足于这种有思维能力的思想回归自身，我们一般把这种回归与反思性观点相联系，只有对思想万能的幻想才能让人们相信，最根本的怀疑能够搁置某些前提，这些前提与我们纳入我们思想

^① 王宏任：《地主——一个百年难尽的话题》，《书屋》2010年第8期。皮埃尔·波尔多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② 《人民日报》1950年8月21日。

中的各种各样的加入、归属、包含有关。”^①

小说后半部分，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写到二十一世纪初，前后也有二十多年。

党的路线端正了，大地复苏，各方面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文件的贯彻，改变了地主、富农分子及其子女的生存状态，调动了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地主子女秦汉阳能够进入高中，毕业后在本村小学当代课教师，不久又被调到长滩镇中心校当上初中教师。宋晓霞姐妹也上了高中，有的还考上了大学。

干部队伍得到纯洁和强化，一些有知识、懂生产、作风正派的干部，进入基层领导班子。昔日混迹在干部队伍高踞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流氓都失势了。在实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以后，这些人因为不懂生产，又懒于劳作，灾祸连连，日益贫困。

秦家湾昔日的少年，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岁。故事中心逐渐转向以主人公秦汉阳（瑞元）和宋晓霞（杏花）爱情生活的一波三折。

故事最后以悲剧结局，双方都是为了依顺父母的意愿，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各自和不相爱的人成了家，也各自饱尝了无爱婚姻的苦果。

包产到户以后，村民们虽然不再挨饿了，但繁重的提留款却让老百姓轻松不起来。秦汉阳因对当地干部乱摊派不服，出头为老百姓说话而惹来麻烦，致使被镇党委书记，也就是自己妻子的情人谎报情况，报请县公安局拘留。在县委干预下，秦汉阳被释放，重新任教。

挫折教训了这个年轻的知识分子，他辞去教职，留下离婚协议书，安排好一切，悄然离开了秦家湾，去走一条新路。

一天。离家十年的秦汉阳以省城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回到了秦家湾，他此次回家是接父母和女儿到省城去居住的。看到山村的变化以后，便向村干部建议，将秦家湾建设成“生态农业观光旅游村”，以实现自己“一起好好建设家乡”的承诺。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天道好还、盈极必亏的历史循环论来解释这局面的倒转。这一切得从更为广阔的视野，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来考察。中国农村进入现代化的轨道比起城市来还要艰难得多。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政府的权力一般只能控制到县，农村是松散的乡社组合，或者如费孝通先生所认为的“差序格局”，中国人的精神观念是一组同心圆，是以己、以家再以社会（社区）、再

^① 皮埃尔·波尔迪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三联书店2009年版。

层层拓展的社会网络结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宗姓是最有凝聚力的。这个家族在财富上、文化教养上、道德上、人脉关系上能占据制高点的，就成为这个村社的实际领袖。这种乡村领袖人物，习惯上称之为乡绅，他们大都是地主。

农村实现现代化，是中国革命的题中之义。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革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一方面，要改换这种控制村社的格局的掌权人。而这两者几乎是合二而一的，因为要剥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重新分配，乡绅一定不会同意，一些土地拥有的自耕农也不会感到兴趣。只有那些生活全无着落、难以生存、敢于冒险的赤贫者，对于这种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才最有興味。这些人当中有极少数是流氓无产者（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游民），为了实现上面的两种需要，他们就成为“土改根子”“积极分子”，冲杀在前。后来他们中有人甚至“入党做官”，成为“书记”“委员”“乡长”“村长”“民兵连长”，罗德彪及其作为靠山的舅舅、火狗子等即是这样的人。

罗德彪及其舅舅之流，品质恶劣，素质低下，以鱼肉百姓为能事。他们不懂生产却偏要瞎指挥，造成许多严重损失，如耗了全公社之力建成的水电站根本不能发多少电，一场大雨就冲垮了，他们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上瞒下、唯命是从。“左”的政策，很对他们的胃口，推行起来，不遗余力。《农历》中通过生动的艺术画面和故事情节，不仅揭露了这些人是怎样主宰人们的命运的，还进而揭示出他们必然走向自己反面的必然性。

上面这些是就《农历》这部小说所作出的阐释。对于这种历史现象，我们许多社会学家或者没有发现，或者虽然发现并未去作深一层的探究。李国仁先生用小说发现，并且用小说加以表现了。恩格斯说过：“在我卧床这段时间里，除了巴尔扎克的作品外，别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读，我从这个卓越的老头子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里有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四八年的法国历史，比所有沃拉贝尔、卡普菲格、路易·勃朗之流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多得多。多么了不起的勇气！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①《农历》也正像这样，是现实主义的“发现”、现实主义的胜利。

人物塑造：尊重生活本身的逻辑

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眼睛，尊重生活本身的逻辑，依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去塑造人物形象。我们在许多被称为“革命文学”的经典小说

^①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83年1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中，看到了太多的虚妄的人物形象：正面英雄人物一定是威武雄壮，道德高尚，而反面人物，即所谓阶级敌人，都是委琐卑劣、狞恶凶残。其实这都是从概念（革命经典著作、官方文件）出发的结果。法国美学家丹纳说过，“我们的美学是现代的，和旧美学不同的地方是从历史出发而不从主义出发，不能提出一套法则叫他人接受，只是证明一些规律。”^①从历史出发就是从曾经存在过的现实出发。李国仁先生尊重自己的艺术良知，尊重生活本身的规律，向历史的深处挖掘，再现了符合那个历史时代情貌的人物群像。

《农历》写到的人物有名有姓、在故事中活动过的，有几十个人，他们之中大多数是秦家塆土生土长的，但也有外村的、镇上的，以及来自外部世界的下乡知识青年。这些人物汇聚成一个人物画廊，或者说，组合成一根人物链。他们相互作用着、影响着。比如几个知识青年的来到，不仅影响了一些土生土长的农村女孩，激发出与生俱来爱美的天性，改变了自己的装束，成为“土知青”，也介入人们的生活，如果不是外地知青肖老师到村小任教，就难以改变秦汉阳的处境，就无法参加宣传队，才华就无法显示，就会阻遏他性格开朗、刚劲一面的形成。这些人物大多数有着属于自己的性格，他们在大致相同的大环境和具体的个人的处境之中，完成了性格发展。

在众多人物中，作者关注最多的是几个地主分子。作品在塑造他们形象时，注意揭示他们的个性特征。先来看一看秦国忠夫妇。秦国忠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不能受风寒，不能从事比较繁重的劳动，挣不到多少工分。在生产队里和家里都没有什么地位，衣衫褴褛，鞋子也是破的，一天到晚低头弯腰，大气不哈。但是他能讨好人，有人缘，因而能到专业队去烧饭，活比较轻，又能多省一点粮食，缓解家庭的困难。在能够用得上他的时候，如写春联、办婚事，他又摆出知晓百事，摆出种种礼数，精神上似乎回复到以前当乡绅的年月。在改革开放摘掉地主帽子以后，他在外头还是小心翼翼，担心别人说自己反攻倒算，在家里却又摆出家长的架子，用传宗接代那套荒唐的理论干涉儿子的婚事。妻子赵桂兰娘家是个开明士绅，本人算不上地主成分。她争强好胜，要面子，顾大局，尽管家庭贫穷，女儿玉贞的嫁妆一点也不比别家逊色，风风光光的，在外面对罗德彪这样的干部，不得不去敷衍，让他们占点小便宜。心灵手巧，有同情心，乐于帮助他人，全村人无不夸她。对家庭内部，疼爱孩子，关心他们的成长。她看起来是温顺的，但是一旦把她逼到墙脚根，她也会反抗。在一次大会上，她义正词严地反驳，说“罗书记！我不是分子，我只是出身在地主家

^① 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庭，包括我爹赵翰文也不是分子，他是被划为开明地主的！我虽然出身在地主家庭，但我还是一个合法的公民，没有哪条法律规定我没有说话的权利！你是共产党的干部，我也没有少见过共产党的干部。实话跟你说，我哥哥赵正禹他也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他在解放前就加入了共产党，他参加革命的时候你还在那里哟？你要不相信我说的，你可以去问问公社王书记，也就是你舅舅，他晓得的！”她之所以委曲求全，是为了几个孩子。对于自己的丈夫的衣食、健康是不大关心的。大概多少有些埋怨，一切的不幸都是由于地主成分带来的。

其他的几个地主分子，如宋本清夫妇和他的哥哥宋本根家，虽然同样是被欺压，甚至亲妹妹春柳被火狗子、罗德彪强奸都不敢声张，但彼此仍然忘不了过去的恩怨，内斗不断；宋本清更是抱住没有被抄走的《万年历》反反复复地看，为自己家和别人找寻吉日和忌日，以显示自己的存在。这对夫妇和秦国忠夫妇一样，为了招一个上门女婿，不惜葬送女儿的幸福。宋本清兄弟俩的父亲宋世芳是老地主，解放前当过一阵保长，有过一些罪行，似乎都不甚大。解放后，坐过两次牢，一次是罪有应得，一次是被诬陷，他已经认命了，只求老老实实平安地度过风烛残年。只有在人们向他问起有关礼仪制度的时候，才会激起他身上残存的活力。还有一个地主秦穆兴似乎更为倒霉。已经怀孕的贤惠的媳妇，在村里人闲言碎语和他的逼迫下自杀，儿子秦国尧发疯，莫名其妙地死去。

这些地主分子，卑微地活着，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他们的性格特征，概括起来说就是“狡诈”，无奈的狡诈，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一种生存智慧，只有在饮酒忘形的时候，或者依着乡风民俗奉行历代相传的仪礼时，才能找回自己。

在《农历》中居于中心位置、作为贯串全部情节的主要人物——秦汉阳，他的基本状况前面已经谈过了，这里只打算分析其性格形成的基本因素及其逻辑发展。他是秦家湾年轻一代中唯一的思想者和叛逆者。书本、学校教育、经典、官方文件之中，一切看起来神圣的东西，与赤裸裸的现实是如此的不相容。在众人谈起节气、命运的时候，年幼的他想起了死亡，表现出对于既存秩序的怀疑。在自己被歧视、诬陷，百般努力和辩解，不但没有效果，反而遭到更多的凌辱的时候，他想到奋起，想到用自己的努力和别的方式去改变自己和处于类似状态的人的命运。他是温顺的，对朋友，对家人，对情人，但又是狠劲、有决断的，为了积劳成疾的母亲，下狠心杀了心爱的狗。然而他又是贾宝玉和贾雨村的料子，既像贾雨村那样急于改变自己的命运，又像贾宝玉那样怜香惜玉。他既欣赏“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又流连“玉在椀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他是柔弱的，又是刚强的、暴烈的。为了不伤父母的心，尽到一个实际上的长子对于家庭的责任，他屈从于父母之命，选择了无爱

的婚姻，为了自家承包的秧田被秦有田家的牛啃了而寻求公平的处置，他拿起锄头要去砸对方的脑袋。为了不合理的提留款的收取，他为农民仗义执言，最后走出山村，浪迹天涯。这种矛盾而又多元的性格，是由于他的生存环境所致，在幼年时代，秦汉阳忍受了太多的屈辱，在回复到与他人同等的地位时，他自尊自重，表现出凛然不可冒犯的姿态，是可以理解的。相濡以沫的亲情，使他走不出家庭封建伦理的约束，因为他觉得父母太苦了，不忍背叛，也许是贾宝玉的基因在起作用。

宋晓霞（杏花），与秦汉阳同是地主子女，同样到县城里上了高中。在爱情与亲情的两难选择上，她作出自以为“两全其美”之决定，把心交给了秦汉阳，把身体交给了石头（实际上是还给了父母）。但是自从嫁给了石头以后，灵魂就无所依附了，自杀不成，为了父母苟活着。为所爱的人献身，为营救他，敢于出头露面，显示出她作为新女性的一面，委曲求全则像是从旧小说中走出来的。

《农历》中作为基层干部的罗德彪和他的舅舅、火狗子以及镇党委书记徐伟等等，也许不是最坏的，但是他们表现出的种种恶德、破坏性、报复性，是流氓无产者所共有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消极的腐化的被视为珍宝，怎不给人们带来灾难和普遍贫困？他们在掌握权力以后消极的腐化的一面，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予取予夺，为所欲为，革命的名义给予他们以合法性和合理性。

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下中农，有一度时间，在基层权力支配上实际是处于缺位状态。有些接近权力的，因为缺乏能力，或者缺少争权夺利的勇气和能力，只能听任那帮流氓无产者颐指气使。秦有田当过一阵生产副队长，除了派工以外，生产管理上一无章法，只会跟在罗德彪后面抓阶级斗争。愚昧、麻木、缺少良知，他的妻子提醒他不要忘了秦回春的恩情时，他还加以反驳。解放以后，他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在推行联产责任制包产到户以后才认为自己真正有田了。但是仍然不能摆脱贫穷，儿子石头不得不到宋本清家做上门女婿。自己也因为要交提留款变卖打棺材的木料，过水坝时落水身亡。从他的命运中，也许会使人领悟到贫富和人们生产资料的占有未必有必然的联系，智力永远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秦穆林虽然是个下中农，但是他的“阶级倾向”很有点可疑，他比较尊重自己的感觉，有正义感，要走勤劳致富的路。因为反对生产队长何德成砍伐树木，蹲过学习班，被工作队抄过家。在地主、富农摘帽以后，责问过火狗子：“是你亲眼看见，还是你爹跟你说的，说他们在过去剥削你

的？是咋个剥削的呢？”在他的心目中地主收租是一种对于土地投资的回报。

李国仁先生不是从定义出发，把人物性格简单地律定为阶级性加个性，不是用书本上归纳出的阶级属性为基本点，再添上点个性特征，而是从生活出发，尊重生活逻辑的本身，写出了曾经活在历史和依然活在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

结语：可以启示于人的

李国仁先生的长篇小说《农历》很有些能够启示于人的地方：

《农历》写出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中国农村真实的图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出那里人们普遍的生存状况，特别是作为专政对象处于社会底层的地主及其子女的生存状况。从实际上揭露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荒谬。

摆脱极“左”的思维模式，表现地主及其子女真实的命运史，不只李国仁先生是，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生死疲劳》、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都以不同的题材内容和艺术方法，接触到这个主题，但是《农历》比起这些作品来，显得更具有直接现实性，特别是，由历史的过去指向未来，不止于理清陈账，还进而指出抚平历史伤痕与改善“三农”状态的关系，即改变农民无权的状态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把一个近于封闭的山村和壮阔的波澜迭起的时代变迁结合起来，在具体而细微的家庭生活、村社琐事、儿女情私中表现出历史的动向。小说，不管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是由史诗、英雄传奇嬗变过来，于细微处见精神，从细事中往历史深处开掘，常常是小说家们的艺术追求。李国仁先生善于把握历史的脉动，善于把种种琐事组合起来，从某个侧面表现历史的进程，而不是把这些描写游离在历史的大情势之外。

乡风民俗逼真的摹写。小说开头，连接川陕两省的商旅古道就隐藏在这崇山峻岭之间，背二哥们背着货物艰难行进的图景是相当震慑人心的，显示了秦川山地人民原始的生命力。秦国忠家玉贞婚事的场面描写，从写喜联到知客司唱座迎客、客人按照尊卑亲疏入席，再到致辞答谢，“六礼完成”，有唱有做有表，旧时的礼俗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再现，也巧妙显示出山村文化精英昔日的神采。

《农历》在艺术创作上的开拓，除了给我们启发以外，还留有一些可以探究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李国仁先生“发现了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发现了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乡土小说作家才能发现的东西。

（秦兆基，苏州著名学者、作家、文艺评论家）

楔 子

农历九月：寒露。

阴沉沉的天空，有鸟在逆风中飞行，像被狂风卷起的树叶，村子周围的树木被风吹得呜呜地叫。而整个村子，却在一片嘈杂和喧闹中混乱不堪。

房前巷尾，到处都是人影，到处都有大声的口号声和呐喊，到处都飘扬着旗帜，到处都贴着标语。不时有人被武装人员和村民从家里揪出来，捆绑着双手站在人群之中，身子不停地抖动着，不时有老幼妇孺在激烈的打砸抢中发出大呼小叫地哀号；不时有猪牛羊等牲畜被人赶了出来集中在门前院坝，不时有粮食和财物被人从家里搜了出来堆放在院坝里。每揪出一个人或没收出一批财物，人群里就会响起一阵阵口号和呼声。

村外的田野里，也到处都有人在忙碌着。一群人在用竹竿和绳子对一块块田地丈量、记录和划界打桩……

深秋的夜晚，天空一片漆黑，四野秋风浩荡。被黑夜吞噬的一大片房舍，亮着星星点点的灯火，房檐轮廓依稀可见。

村子西北角的一户人家，门窗紧闭，屋内亮着微弱的灯光。

在昏暗的油灯前，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显得有些惶恐不安，紧张地看着一个身着长衫、须发花白的老者将一本发黄的线装书放进一个木匣子……突然，一股冷风从窗户的缝隙灌进来，两人都同时哆嗦了一下。

灯盏里如豆的灯苗忽闪了几下，最终没有熄灭。

就在这时，整个村子突然又变得躁动不安起来，像夜的潮汐。小孩的啼哭以及大人的斥骂和诅咒在黑夜里时断时续，四周的狗叫声却是越来越急促……

农历七月：立秋。

太阳在天空发出耀眼的光晕。苍鹰在头顶盘旋嘶鸣。

一支身背货物、手拄打杵的背二哥队伍正艰难地行走一条荒凉的古道上。

这座山来那条河呢，

我是秦巴山的背二哥哟。

.....

这是一群家住大山里的庄稼汉子，是一群从北往南背运货物的秦巴县的背二哥，他们背上背的是用麻袋装着的食盐，还有用铁桶装着的煤油。他们袒胸露肚，一张张脸被憋得通红，衣裳早已被汗水湿透，额上仍在一个劲地往外冒着汗水。随着他们沉重的步履，带有铁钉的打杵杵在石头上发出叮当的声音。他们每每将打杵往身后一撑作短暂的喘气歇息时，总是习惯地甩一把汗，抬头望一眼天空的太阳，再长长地吆喝一声后，便扯开嗓子吼几句山歌。

秦巴县，位于川东北米仓山南麓的大巴山缺口处，北与陕西省南郑、西乡、镇巴三县毗邻，东接万源市，南接平昌县，西与巴州、南江二县相依。历代旧志皆云：“依三巴之旧城，控全蜀之左隅”“后连延于秦陇，则迤邐之荆吴”，北扼“巴梁之冲要”、东扼“蜀楚咽喉”。因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自陕西入川建立了中华苏维埃第二大苏区，而使秦巴县成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全县总人口在不足二十三万人的情况下，却有四万八千余人参加了红军；又因大山延绵、沟壑纵横、溶洞无数的特殊地理地貌，境内银耳、木耳、核桃等土特产及天麻、金银花等中药材较为丰富，所以，秦巴县素有“一府三乡”（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中国银耳之乡、溶洞之乡、红军的故乡）之美誉。

而在川陕接壤之处的秦巴县，正是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限制了人们的出行，致使祖祖辈辈的人一直都在大山里如虫蛇般爬行在崎岖的山路上，很少有人走出过大山。境内唯一一条连接川陕两省的商旅古道，也隐藏于逶迤绵延数千里的高山峡谷地带或崇山峻岭之间。